



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

[美] 亨利·基辛格 著

范益世 殷汶祖 译

Kissinger

Vol.
4

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

[美] 亨利·基辛格 著

范益世 殷汶祖 译

Vol.
4

上海译文出版社

**WHITE
HOUSE
YEARS**

Henry Alfred Kissinger

目录

第四部分 一九七二年：从战争到和平

- | | | |
|------|-------|----------------|
| 1301 | 第二十四章 | 尼克松的中国之行 |
| 1356 | 第二十五章 | 河内孤注一掷：越南的春季攻势 |
| 1386 | 第二十六章 | 秘密访问莫斯科 |
| 1438 | 第二十七章 | 摊牌：在北越港口布雷 |
| 1482 | 第二十八章 |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
| 1553 | 第二十九章 |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之后 |
| 1573 | 第三十章 | 萨达特驱逐苏联人 |
| 1603 | 第三十一章 | 从僵持到突破 |
| 1676 | 第三十二章 | 通往和平的坎坷道路 |
| 1718 | 第三十三章 | “和平在望” |
| 1809 | 第三十四章 | 和平终于实现 |

第四部分

一九七二年：从战争到和平

第二十四章 尼克松的中国之行

黑格的先遣任务

在尼克松总统宣誓就职三周年的时候，我们正忙于准备一件大事：美国总统访问北京。这在一九六九年是谁也不能想象的。一九七二年初，我们有希望在其他方面取得进展——比如对苏联的关系和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但是，同中国举行最高级会谈才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

中国对我们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力量强大。周恩来反复强调说中国不是超级大国，这是言之有理的。事实上，如果中国更强的话，它就不会这样一心一意地寻求同我们改善关系了。北京需要借助于我们来摆脱孤立，并抗衡它的北部边境上潜在的致命威胁。我们需要借助于中国来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灵活性。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时机干预世界事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始终是参与世界事务的，但是，无论在物质上或道义上，我们的优势地位都不如以前了。我们必须考虑到其他力量中心，并努力在它们之间保持平衡。对华采取主动还使我们的国家政策恢复了应有的立场。它把印度支那还原到它恰当的位置——一个大陆上的小小半岛。它的戏剧性效果减轻了美国人民在我们从东南亚撤退时必然要感到的痛苦。它也使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的看法恢复了平衡。

新年伊始，一个美国技术小组飞抵北京。这个小组由我的助理亚历

山大·黑格准将率领，他的任务是设法使我们的先遣人员的想象力能有一点约束。霍尔德曼和尼克松决定到中国去运用他们关于公共关系的信条。他们不厌其烦地向不知其中奥妙的人解释说：印刷新闻，即报纸，对公众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电视却能在几分钟时间内改变人们的观念。况且他们感到，文字记者给他们吃过的苦头超过了电视记者，这次北京之行将是报复的大好机会，办法是在随行记者团中大大增加电视工作人员。这一决定给电视系统的负责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电视网播送节目的时间有限，所需的电视记者和技术人员的人数，即使为了进行饱和采访，也是有限的；又因为，白宫公共关系专家给了电视系统绰绰有余的新闻人员名额，这样，好多近十年来不作新闻报道的上层人物就得到了一次免费访华的机会，而有些报纸却完全被排斥在外了。

从电视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时间比我们早十三小时，这就提供了额外的方便：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晚上的活动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要是东道主能合作的话。因此，想法子使那些文化革命中幸存下来的中国官员们充分认识美国公共关系的神奇作用，就成了先遣人员的一项任务了。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中国人有抵制野蛮人入侵的古老方法。这些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们一弄清我们先遣人员的来意，就立即意识到，由美国总统介绍给美国电视观众，从而立即成为受欢迎的人，有很大的好处。他们急切地同意了霍尔德曼的想法。当时，北京和美国之间没有直接的电视转播设备，这只是一个暂时的问题；安装了一个地面接收站，通过卫星转发电视片，问题就解决了。中国人信守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格言，买下了地面站，拒绝让我们的电视广播公司自己花钱来建造地面站。

一月初黑格打前站之行，解决了我们的先遣人员的主观愿望和中国是个主权国家这个不方便的现实之间的绝大部分矛盾。安全部门不让总统乘坐中国的轿车，但是中国领导人却认为，如果他们突然改乘美国大型高级轿车的话，“群众”就会不理解。最后双方妥协，尼克松如果个

人外出活动，可以坐他自己的防弹轿车；但如和周恩来一起外出，就要乘坐总理的车。类似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要为总统提供在中国境内飞行的座机。经过一番内部斗争，安全部门才勉强同意：我方根本不能对东道国说，他们的飞机不保险。如果安全部门坚持己见，我们就可能无法在中国旅行了——认识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了。总的来说，中方以很高的技巧和我们的先遣人员打交道。只要他们同意了的事，都以出奇的效率兑了现。至于旁的要求，那就消失在穿不透的婉拒的迷雾中，永远也不会有照面的机会了。

黑格和周恩来就政治问题进行了两次私下会谈。黑格向周恩来介绍了我方对于不久前结束的印巴危机的看法。周恩来同意我们对待这次冲突的态度。他认为，苏联在印巴次大陆推行的政策，并不是中美和解所激发的一种变化，而是俄国扩张主义趋势的历史性表现。关于越南，周恩来重申对河内的道义上的支持，并敦促迅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削弱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黑格还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美方对拟议中的最后《公报》有关台湾的敏感段落的新对案——这是我一九七一年十月之行未及解决的主要问题。周恩来只是答应说，在总统来到之前给予考虑。关于台湾问题的这几句话的谈判，后来在总统访华期间占用了很多时间。

我不知道哪个总统的出访有过这么细致的计划，也不知道哪个总统本人做过如此认真的准备。一本本厚厚的参考资料（在我的指导下由我的助手温斯顿·洛德和约翰·霍尔德里奇编辑的），收录了有关这次访问的主要目标以及有关已和中方商定的议程中各项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估计了中国在各个议题上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总统可以应对的论据。我在七月和十月同周恩来的各次谈话也都分类摘录了。还有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人的长篇分析，由中央情报局和我的班子里的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H·索罗蒙编写，作为背景材料。还有西方中国问题学者写的文章和书籍中的长篇节录，这些学者包括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

尔、丹尼思·布拉德沃思、费正清、C·P·菲茨杰拉德、斯图尔特·施拉姆和安德烈·马尔罗。尼克松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的参考资料，这可以从他到处在重要语句下面画线一事上看起来。像惯常那样，他把论据一一铭记在脑子里，待到和周恩来会谈时小心背出来应对，同时又力求造成出口成章的印象。

我们从马尔罗的《反回忆录》中选出的段落，竟然促成尼克松在最后一分钟邀请这位法国伟人来白宫做客。当年法国把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借给我们展出时，约翰和杰奎琳·肯尼迪夫妇曾为马尔罗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那次盛会对尼克松的影响真不小，以致他想比他所嫉妒的前任更胜一筹。肯尼迪的晚会主要是个艺术集会，这在尼克松的眼光里无非是“花花絮絮”，而他和马尔罗的会见却纯粹为的正经事。他和这位法国作家的合作不是为了搞一场社交活动，而是为了准备一项历史性的使命。

不幸的是，马尔罗对中国的了解太过时了，他对中国近期目标的预言是完全错误的。比如他认为，中国邀请尼克松说明它需要经济援助；中国人对尼克松的评价将取决于他能否提出一项援助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考虑到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思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说得好一点，马尔罗的想法是早了好几年。

不过，马尔罗的直觉却证明了艺术家的洞察力常常比专家或情报分析家更能抓住问题的本质。马尔罗的许多判断后来证明是非常深刻的。他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这是中苏分裂的必然产物。越南战争不会构成障碍，因为中国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中国在越南的作用只是一种“假象”；中国决不会有效地帮助越南；中国对越南的宿怨太深了。中国人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他们首先信仰的是中国。

马尔罗说，美国在越南的作用如今已非实质性问题。重要的倒是我们在太平洋的政策。如果日本不再相信我们的核保护，它就会转向苏联。如果我们能继续把日本和美国拴在一起，这就可能促使苏联乃至中

国更加需要去专心致志地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马尔罗警告说，过些时候，早的话可能在两年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就会发生矛盾，而需要小心调整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决不能被人看出是在犹豫不决；整个亚洲需要美国坚定。马尔罗说，中国所寻求的首先是统一、荣誉和尊严。到头来也是想要解脱经济困境的。

那是一场极精彩的表演，听众的思想却还为十年来的成见所禁锢，不能加以充分欣赏。马尔罗一面用幻想家的眼光把听众吸引住，一面口若悬河，一泻千里。与其说他作了一个前后连贯的分析，倒不如说他描绘了一系列出色的场景。马尔罗已经有快十年未去中国了；他显然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也不掌握内幕情况。他有的只是敏感、锐利的洞察力和精明的理解力。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的直觉同我们逐渐获得的实际知识相结合。

二月份是在期待中度过的。一月底的时候，我们和北京有过一次令人不快的意见交换。联系总统一月二十五日的讲话，我们向中方详细通报了我们屡次遭到河内拒绝的情况。周恩来回复了一封尖刻的信，指责我们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纠缠到越南问题中去。这样讲，一半是事实，一半倒是启示。我们本来希望中国会对河内施加压力。但是既然北京采取不卷入的姿态，我们也很满意。

二月九日我们发表了总统的年度外交政策报告。在尼克松执政的前四年，这种报告每年都是由我和我的工作人员起草的。我们感到难过的是，不管我们怎么认真推敲，我们总达不到我们的根本目的，不能使新闻界把它作为一份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哲学的声明来对待。报界每年报道的几乎都是关于印度支那的一节；我们想启发人们讨论美国在全世界的目标，而结果总是引起关于对越南策略的辩论。不过，一九七二年的报告中有一段关于中国的内容，回答了去年七月十五日戏剧性公告发表后人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目前对台湾的义务是什么；我们是否正在“转移我们的重点”，从东京转到北京；这对我们的对苏政策会发生什

么影响。总统的报告肯定了所有现有的对盟国的义务；我们不会因打开对华关系而放弃和日本的二十年密切关系。在我们抵达北京前不到两星期发表的这份报告，重申了我们对台湾的“友谊、外交关系和防务义务”；强调了“有关各方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将大大有助于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

至于苏联，我们作了一个老一套的辟谣表态，说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莫斯科的”。但事实上，正是苏联的威胁使中国和美国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合作反映了一种地缘政治的现实，产生于对苏联军事力量不断增长的忧虑。我们可以避免挑衅行动；但我们却不能消除这种新关系的明显影响。如果处理得巧妙，它能够促使苏联克制一点，合群一点；如果处理得不高明，可能正好促成企图避免的那种危机。

二月十一日，总统对中国作出了另一个姿态。他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部长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松动对华贸易关系的一套新建议。二月十四日宣布了这一消息。从那以后，所有可以卖给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商品同样可以卖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我们对北京的最后一个单方面的经济姿态。

二月十七日，总统在同国会领袖们进行简短的告别会见以后，来到停在白宫草坪上的直升机前。仅此一次，尼克松未唱高调。他只是谈到有许多来信来电预祝他成功。他表示希望，后人会用“阿波罗十一号”的宇航员留在月球上的那块纪念牌上写的“我们为了全人类的和平来到这里”这句话把他的这次旅行载入史册。

抵达北京：握手

尼克松的第一站是夏威夷；为了避免人们对铺张浪费的批评，他在一个陆军基地停宿，可是一发现这里的艰苦环境又懊悔了。以前在亚速尔群岛，这次在夏威夷，屈尊住在一个小防区司令官的房子里，看上去

大有爱国的自我牺牲精神。旅途中，我从霍尔德曼那里领教了如何保证使尼克松能得到最有利的电视镜头。齐格勒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被告知说，在北京期间他不能在新闻发布会上谈任何实质性问题，他已经在害怕遭受记者的折磨，这些人受新闻报道时限的驱使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整个旅途中，尼克松时而担心手下平常能干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忘了公共关系中的某些细节，时而认真而潜心地为访华做准备。看完了所有的参考资料之后，他在长时间的飞行期间就像打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九点我们到达上海稍事停留，以便让中国领航员登机。同我以前的几次访问唯一不同之处是，现代化停机楼前的一根旗杆上这次有一面孤单的美国国旗在飘扬。我几次经过这个机场，都没有看到过其他任何一个旅客或任何一架降落或起飞的飞机的影子。在上海欢迎尼克松的是乔冠华，他名义上是外交部副部长，但实际上是外交部的关键人物。据说他是周恩来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这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略有一些周恩来的风度、博学和智慧。在场的还有我前两次访问时认识的章文晋（西欧美大司司长）和王海蓉（礼宾司副司长，据说是毛泽东的亲属），他们两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曾陪同我从巴基斯坦前往北京。中国人殷勤好客名不虚传，准是认定未开化的外宾快饿坏了，因此以创纪录的速度给我们送来了丰盛的早餐。这一下子使白宫的工作人员心里为难了，因为他们知道，从此尼克松会要求他们加快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服务速度。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即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时刻是事先作了准备的。尼克松和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镜头拍摄总统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他应该是单独一个人。尼克松读过我在七月访华后写的报告，知道周恩来对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种失礼行为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罗杰斯和我要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抵达北京之前，我们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再忘记了。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到那时有一名粗壮的副官挡住了“空军一号”的通道。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必定大惑不解，不知道官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出了什么事情。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是尾随总统沿舷梯鱼贯而下的。尼克松单独一人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

我们站在寒风凛冽的停机坪上，欢迎我们的是一支仪仗队、体态优雅而纤弱的周恩来以及一批穿着同样毛式制服的中国显要人物。这些人穿着都一样，但当然是严格按政治身份依次排列的。欢迎仪式是极为低调的。除了三百五十人组成的仪仗队以外——这个仪仗队的严格纪律是我随总统出访中印象最深刻的——整个仪式简朴到了极点。这样极度的简朴反映了一个真理，只有最紧迫的必要性才使这两个国家走到一起来——它们的其他关系根本不配享有国事访问常有的那种喜人的欢迎仪式。

中国人事先没有告诉我们，是否会准备任何形式的群众欢迎。当我们的车队驶入市中心的时候，霍尔德曼在和齐格勒的无线电通话中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我们，那里会有多么值得上镜头的人山人海。这个希望落空了。中国本来到处都是人，可这时却被挡在横街小巷里，所以当我们的车队快速通过广场时，巨大的广场空无一人。车队驶过紫禁城的红墙和它对面那庞大而墩实的人民大会堂；驶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这幅斯大林画像肯定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了）；开进了坐落在钓鱼台湖畔的国宾馆。

我们下榻在两幢楼里。总统和他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我也包括在内）住在大一些的楼里；国务卿和他的随行人员住在几百码远的一幢小楼里，这楼我在前两次访问时住过。这两幢楼各有餐厅和厨房，这样就把

两批美国官僚之间的日常联系压缩到了最低程度。中国人很熟悉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在北京的中心依样安排了在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的鸿沟。

一到总统的宾馆，全体人员都被带到宽敞的会客室里就座，这里的沙发摆成一个圆圈，中央留出很大一块空间。周恩来的夫人在那里迎接我们，在场的还有叶剑英元帅、代理外长姬鹏飞、副外长乔冠华和其他官员。接着送来了茶水。周恩来主持了友好的交谈，时而开几个玩笑。和往常一样，他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中的每一个成员。

就这样，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到中国式的外交。苏联人一般比较生硬；中国人拐弯抹角。苏联人坚持特权；中国人讲究普遍的原则，表现出自信心，试图使实力问题显得无足轻重，而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苏联人把友好作为谈判成功后的奖赏。中国人在谈判之前就把友谊作为缰绳。他们至少在形式上使对方成为私交，这样就微妙地限制了对方能提出的要求。苏联人所居住的国家曾屡次遭到入侵，近期则主要利用武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连对自己提出的道义主张都没信心，心虚到不敢承认犯错误的可能性。他们从绝对正确的教条转移到不可改变的立场（不论他们的立场改变了多少次）。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这一片地区执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评作为工具来为自己服务。他们征求来访者的意见——这是一种赢得同情和支持的谦虚姿态。这样做还可以使来访者说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目的；结果他就约束了自己，中国人以后就能够引用他自己的建议（而且时常这样做）。苏联人脾气暴躁，有时口是心非，给人留下一种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国人则强调中国价值标准的独特性，因为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们表现了一种不为压力所左右的优越感；他们甚至用暗示“原则问题不容谈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对方施加压力。

在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从不搞小动作；他们不讨价还价；他们很快就

亮出底牌，进行说理，顽强地加以辩护。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每次对中国的访问都像是一出认真排练过的戏，什么都不是偶然的，然而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中国人记住每一次谈话的内容，从低级官员到最高级政治家说的话全都记住。中国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拼图游戏中的一块，尽管一开始我们这种简单的头脑还没有看清整个的图案。（后来，温斯顿·洛德和我确实学得很擅长这样做了。）我前后访华十次，好像是在跟一个有机体进行一次连续不断的谈话，这个有机体能记得每一件事，似乎由一个头脑在指挥。这种会晤令人振奋，而有时又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样严格的纪律和彻底的献身精神使人不禁产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这是外国人在接触到中国文化时常有的感觉。

尼克松这次访华也是这样。到喝完茶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正像七个月前我在秘密访华时所感到的一样——自己已经被接纳进了一个有严格限制的俱乐部，虽然那时连一次实质性的谈话都还没进行过。

毛 泽 东

实质性的谈话没有耽搁很久。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里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能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并且和往常不同地固执地说：“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他想很快和他见面。”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周恩来有些不耐烦地说，他将把他的讲话稿事先给

我一份。最后我说我就去请总统。

这样，总统和我坐上了中国轿车前往紫禁城，同现代历史上的一位巨人进行第一次会晤。洛德作为记录员也跟来了。洛德的出场没有张扬出去，以免国务院更加不高兴。实际上国务院的人员一次都没有列席过同毛泽东的谈话。五天之前，尼克松就告诉我说，他想让罗杰斯国务卿和马歇尔·格林助理国务卿去忙别的事情，这样他就可以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讨论敏感的问题。中国人也没有邀请罗杰斯列席，这可能是因为国务院在上一年曾说过台湾的法律地位“未定”。然而我是可以坚持让罗杰斯也来的，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尼克松和中方都不会拒绝。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本来有特权、甚至是义务，提请总统修改他认为不明智的决定。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这个疏忽在技术上无可非议，但实质上是不应该的。本来不应该把国务卿排除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之外。

毛泽东这个毕生致力于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结构和面貌的统治者实际上住在紫禁城内，像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那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去见他的话，那是奉召去朝见君王，而不是应邀去会见政府首脑。我曾五次见过毛泽东。每次我都是像尼克松一样突然受到召见的。有一次我访华时，毛泽东表示有兴趣见见我的妻子南希。当时她正在商店里买东西，但这对我们的中国东道主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一个似乎确切了解她行踪的礼宾官员立即把她从一家商店里拉出来，带到毛泽东跟前。而陪同她的国务院安全官员失去了保护对象，被撇下来在那里冲着不懂英语的售货员表示对于在北京中心发生绑架事件感到震惊。

我们的车接近毛泽东的住处时通过一个红色的大门，门前有两个人民解放军战士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墙院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

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我们走进一间小会客室，然后穿过一条宽的过道，我来访问时至少有两次看到这里摆着一张乒乓球桌。

走过过道，就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在我最初几次访问时，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后来就不见了。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 V 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见是突如其来的以外，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在我最后的几次访问时，他由她支撑着）。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